

刘基、宋濂和戴良是元末明初浙东文士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经学、文章共擅，事功、学问兼济，是理学名儒，也是文学高才。在政治道路上，刘基、宋濂成为明王朝赫赫功臣，戴良却是元王朝忠诚遗民。



元末明初 浙东三作家研究

魏青 著

齊魯書社

元末明初 浙东三作家研究

魏青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 / 魏青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333 - 2395 - 0

I. ①元… II. ①魏… III. ①刘基(1311 ~ 1375) — 人物研究
②宋濂(1310 ~ 1381) — 人物研究 ③戴良(1317 ~ 1383)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9490 号

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

魏青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3
字 数 367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2395 - 0
定 价 38.00 元

序

邓绍基

2010年2月6日，农历腊月廿三，传统民俗谓之“小年”，又称交年日，意谓年节开始。是日山东师范大学魏青学人来电祝贺年禧岁厘，同时告我佳音，她的专著《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已交付齐鲁书社，即将出版，嘱我作序。多年以来，大凡年轻学人问序于我，我总不敢推辞，原因有二：一是为学林增添新著而欣喜，二是为能先睹佳作而快慰。这次魏青学人雅意相托，盛情难却，因于新春之际，执笔作文如下。

我尝回顾平生，师辈长者中多有五四前贤、民国学人，叩钟问学，诚属幸事。新时期以来，凭借参与学术研讨或论文答辩的机会，结识诸多青年才俊——博士和硕士们，也属幸事。我不止一次说过，要充分估计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学界所取得的成绩。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要重视历史积累，我认为，近三十年来最值得总结的一种积累，是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大致上说，是从1978年首批入校、1981年毕业的研究生开始不断地涌现出来的，

已形成了群体。现在他们又在教育、培养研究生，其中将来也总会产生有成就的人才，那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了。

魏青学人也正是上述“群体”中的一员，上个世纪末她在山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师从著名学者徐朔方教授（今已仙逝），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博士生毕业。我记得读到她撰写的关于刘基和宋濂研究的论文是在2000年夏天，她利用暑假来京访学，主要去国家图书馆读书，为她撰写毕业论文做进一步的准备。期间她曾来文学研究所访问，并带来一份题为《刘基和宋濂》的文稿，这是她的毕业论文试写稿（实际上是试写稿的修改稿）。那年春天我曾因病住院十余日，至7月间精力方得恢复。我记得到9、10月间才读完她的试写稿，这份文稿从刘基、宋濂青年时代共事一师写起，到他们分别在仕途、科场上遭遇坎坷，再到他们共同应聘投效朱元璋，直到先后在受到种种打击下寂寞、凄凉地死去。乍看只是在描绘这两位朋友的一生交往，但实际上涉及元末明初的重要政治事件，涉及他们的不同的性格悲剧。资料丰富，多有见地。文中对刘、宋二人应聘赴应天府途中既有青云动高兴之情，又有风雨晦如磐之感的矛盾心态的描绘和分析，文笔流丽，见解独到。那时《殷都学刊》上辟有元代文化研究专栏，于是我将此稿推荐给该刊查洪德先生，因为刘基、宋濂虽称明代文学之祖，但实际上还属元明之际的作家，后来文章发表在2001年第1期的《殷都学刊》上。无庸说，此文成为魏青学人毕业论文的一个部分，如今也保存在这本专著中。

魏青学人自浙大博士生毕业后，返归济南，任教母校。多年来，我没有见到她的毕业论文成集出版，却在有关刊物上见到其中的篇章。如今我看到这本专著的目录，才明白魏青学人采用“集成、分散、再集成”的办法来作修订、改进，以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如今这本专著中的刘基和宋濂部分较之原论文在质量

上更趋提高了。从撰写论文到出版专著，或许“姗姗来迟”，但质量第一无疑是我们大家的共识，也是追求的目标。

这本专著的前言中说，著者在完成毕业论文后，原拟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的浙东作家群体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后因故放弃，但对戴良的个案研究兴趣甚大，故自2006年起写作并完成了《戴良研究》。我记得2007年冬天魏青学人来京参加在北京师大举行的元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就是研究戴良的论文，题为《戴良生平行踪考论》。据我所知，论文曾获得专家好评。

那篇论文实是这本专著中的《戴良研究》的一个部分，我读后的印象是，它记述戴良一生行踪仕履充分细致，资料运用与文章铺叙结合繁密，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关于戴良在至正二十六年张士诚政权行将灭亡之际，离开平江，渡海北上，却又停留于胶州昌乐，不再前行，复又南航返鄞这段经历，前人与今人有种种解读。魏青学人则持一种慎重态度，文中说戴良“北上中原，欲有所活动”，并引戴良《赠蒲察镇抚诗序》，确认他北行目的是“以归我王相总兵公”，所谓“王相”，即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平章政事（实为副相）察罕帖木儿的外甥、养子。至正二十五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拜左丞相。十月，封河南王，总天下兵。著者还引述戴良《吴君墓志铭》中自言拟由海道抵京师意图。戴良的朋友丁鹤年《奉寄九灵先生》诗中写道：“挟海怀山谒紫宸，拟将忠孝报君亲。忽从华表闻辽鹤，却抱遗经泣鲁麟。丧乱行藏心似铁，蹉跎勋业鬓如银。万言椽笔今无用，闲向林泉纪逸民。”可见戴良渡海北行原是要“谒紫宸”，到大都去的。那么，为什么戴良在既未去大都，又投扩廓帖木儿未果的情况下，即航海南返呢？本书的论叙中实际上说了三个原因：一是张士诚东吴政权很快覆灭；二是元王朝内哄，扩廓帖木儿被罢职；三是朱元璋军

攻入沂州、东平等处。这三件大事是紧接着发生的，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东吴政权灭亡，十月，扩廓帖木儿罢官，被夺去军权，十一月，朱元璋部下名将徐达率军攻下沂州。这本是三件历史事实，却构成促使戴良立即南返的缘由，这实际上又说明戴良此番北行，确是有投奔大都元王朝，依靠扩廓帖木儿，抗拒朱元璋的目的。否则，也就很难解释他南返后坚持遗民立场，乃至不惜以自裁以拒明的行为。

关于戴良渡海之行，他的《始发吴门》诗中说：“及兹将使命，翩然就行役。”同时又有“款款身既闲，悠悠意何适”之言。前人解说则有同有异，还有为张士诚“乞师”的推测。本书著者行文中都有明叙，但或许出于谨慎，没有展开必要的讨论，是为美中不足。

戴良一生以道学、清高自许，他在元朝未任要职，但他始终坚持忠于元王朝的立场，晚年甘当遗民，他在《蒋彦章来访别后怀之》诗中写道：“功名久已成渐尽，节操由来与世存。久说首阳薇可采，为歌遗事却消魂。”他所说的“节操”实与丁鹤年说的“忠孝”相一致，这里所说“忠孝”是偏义复词，“忠孝”即“忠”。但这还只是遗民的“共性”，元亡后，有一批能文善诗的作家以遗民自居，如张昱、钱惟善、舒頔、李存和王逢等，而王逢也是“遗民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一生布衣，不存在不仕两朝的问题，但他怀念元朝末代皇帝的感情十分浓厚，而对朱元璋极蔑视，称他是“孺子成名”，是“南朝皇帝”。他自称“平生气节诗千首，才非元亚甘刘后”。“元”指元好问，“刘”指刘因，实际是以忠于金室的元好问、刘因自喻。王逢所说的“气节”，当也不脱忠孝大义，也还是“共性”。像戴良、王逢这样的遗民，自还有其性格特点，自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家庭影响、师友影响等。本书著者认为戴良坚持忠元立场，至死不变，

或受其师余阙的影响，当属中肯之见。至正十八年，余阙在安庆率军和红巾军陈友谅部作战失败，自杀身亡，是衰落的元王朝中最早出现的“死节大臣”之一，朝野瞩目，乃至震动，不少南方儒士做诗哀悼。我尝有一看法，余阙以色目人而成为名儒，就其着意经术、执着理学、坚持气节并对南方儒士产生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而言，戴良拜他为师是必然的，对他的崇拜更是必然的，戴良师出多门，从他的生平行事，特别是忠元的坚定立场看，受余阙影响最深，无疑是余阙的最忠实的弟子。正因为我持有这个看法，我很同意本书著者对戴良和余阙关系的看法。

本书中说：“元代历时甚短，自元军占领临安（今浙江杭州）到明兵攻下大都只有92年。于是出现一个独特的‘遗民现象’，当那些宋遗民还未全部去世，元遗民就已陆续出生了。就是说，宋遗民和元遗民只差一辈。更显独特的是十分著名的宋遗民谢翱和方凤的再传弟子中却产生了十分著名的元遗民戴良，戴良是柳贯的弟子，而柳贯正是方凤、谢翱的弟子。”著者所说的“遗民现象”，既是历史政治现象，但说到底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有的辞书把“遗民”定义为不仕异代之人。但从历史上有名的宋遗民和明遗民的情况看来，并不能简单地以不仕异代来作解读，因为其间还有不同形式的对剑与火交织的征服暴行的抗议和斗争。至于本书著者所举的方凤和戴良之间存在的师承关系，却涉及到一个深刻的历史现象，老师忠宋拒元，再传弟子忠元拒明。再以上文提到的王逢而言，他自己分明忠元拒明，却以忠金拒元的元好问和刘因自比。这里存在的深刻性是政治立场相异而伦类观念归一。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遗民现象”说到底是历史文化现象。元代忽必烈可以容忍刘因，明代朱元璋不能容忍戴良。戴良自己为了不仕两朝，不惜自尽。本书著者提到戴良临终之时，却以“忠孝大节”嘱咐子孙，显然，戴良认为他的子孙后裔可以

出任明代官职。这类现象，历朝都有，也属遗民本色之一，实际上也表现出来一种文化伦类观念。

历史上遗民们坚持的君臣之分、忠孝大节和华夷之防一类的思想，对于方今人们尤其是青年来说，已感陌生，已觉云遥，已归陈旧。但历史上的“遗民现象”不仅须要研究，还有待深入研究，至于那些杰出和优秀的遗民之作特别是长期传诵的遗民诗歌更是永存的文艺篇章。我想，本书的著者如果重拾前志，继续研究元明之际的浙东作家群体，或许还能在“遗民现象”这类问题上再做个案研究，有所发现，有所收获。

二十年前，我参与撰写《元代文学史》时，曾对戴良的别集做过一点调查研究，限于时间，很不深入，脑海中一直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到底有没有洪武刻本？二是《九灵山房遗稿》与《九灵山房集》多有重复，不像是补遗之稿，疑莫能明。其后虽读到有关论文，有所得明，却又未必都能解惑。本书著者在这些问题上有深入的研究，著者根据外证和内证，确认《九灵山房集》在明英宗正统九年开刻，次年工竣，主持此事的是戴良的从曾孙戴旒，他写跋文记录此事，跋中还说到他的先人在宣宗宣德年间有刊刻之愿而未遂。言之凿凿，确实可信。而“洪武本”云云，与戴良后裔之说不合。再说，戴良在洪武初隐姓埋名，在今宁波、余姚一带东躲西藏，终被发现，征召到南京，但坚持不仕，洪武十六年在南京自杀身亡，实是抗命朱元璋，他的集子在洪武年间几无可能刊行。事实上，记录洪武本的陆氏《甬宋楼藏书志》不提戴旒跋文，显然是避免出现正统年间刊刻字样。先前有学者怀疑所谓“洪武本”是书贾作伪。本书著者则进一步判断所谓“洪武本”实是正统刻本，只是抽去正统本中的跋文，以充旧刻。我比较倾向于这个判断，我早先曾听前辈学人说，有一部所谓“洪武刊本”的《今古奇观》，正是把序文一类予以抽去，但这类做

法其实很拙劣，因为作伪者不可能把正文中出现的洪武以后的年号统统删去。

在我看来，《九灵山房集》的所谓“洪武本”问题，实际上涉及对著名藏书家之言也要以平常心去作评断，不能盲目迷信。清末陆心源藏书十分有名，但他的《皕宋楼藏书志》未必条条可靠，千虑一失，原为常事，何况这个《藏书志》是否都出自陆氏之手，也大可怀疑。

关于《九灵山房遗稿》，并有两说，清代四库馆臣认为此书所收诗文皆不出《九灵山房集》三十卷和《补编》二卷以内，清人胡凤丹却认为《遗稿》乃补三十卷别集与二卷《补编》之未载，胡氏望文生义，乃有臆说。但要驳倒他的说法也须化功夫，本书著者经过详细对校，不仅对胡氏误说作了有理有据的驳正，而且提出了对《遗稿》的新看法，原来它收录的作品不仅未能超越正统原刊和补编，而且它的编辑者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原刊别集的全帙，而是自原刻本的残本或选本中抄录而成的。总之，本书中关于戴良别集版本源流的考证和探索颇具功力，在扎实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看法，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探究、研讨戴良别集版本的最全面的篇章。

我年来疾病缠身，正在休养中，精力不佳，以上云云，都是零星感言，拉杂写来，权充序文，恳望著者、读者多予指正。

2010年灯节前夕

前 言

“浙东”作为行政区划名称，始于唐代。唐初，浙江隶属江南东道，唐肃宗以后，分置浙江东道、浙江西道。北宋置两浙路，南宋时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浙东、浙西之名自此约定俗成。浙东，在元代隶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在明、清两代隶属浙江省。《浙江通志》卷一载：“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为浙东。”^① 如此而言，浙东、浙西是依江而划的，所谓“浙东”，应指浙江下游（即钱塘江）以东地区。本书对“浙东”一词的界定，即取此义，其中所涉及的三位主要研究对象刘基（处州人）、宋濂（金华人）、戴良（金华人）皆属浙东文士。

本书的写作历时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1998年至2001年读博期间完成的毕业论文《刘基和宋濂研究》，后一阶段是工作以后从2006年至今写作完成的《戴良研究》，它是对以往博士论文的延续和拓展。最初曾想把以刘基和宋濂为代表的浙东作家群体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然而因为时间和精力所限，

^① 《四库全书》本。

不再作考虑。当然也可以围绕刘基和宋濂的比较研究继续挖掘和扩充，但是相对于戴良的个案研究，后者写作的兴趣更大，故而最终选择以戴良作为新的研究题目。因为前面从比较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交叉研究，而后面仅取一位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写作体例上难成统一，因此在整理成书时，权且分为上下两编，以示分明。

刘基、宋濂和戴良是元末明初浙东作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皆以正宗的程朱理学为主导，但同时又受到浙东学派理学家的影响，不空谈理气心性，讲究通经史以致用，立足社会现实。他们都有志于用世，身处时代变革的潮流中，却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刘基和宋濂选择与朱元璋和他的政权合作，分别受到赏识和重用。刘基以经学兼治事功，宋濂以经学兼治史学，他们二人最终成为明朝显赫一时的开国文臣。戴良则不然，他穷且益坚，始终不忘旧君故国，甘当元之遗民，以经学兼治气节立身。不过，最终他们的死都不得其所，充满时代和个人的悲剧色彩。刘基、宋濂和戴良亦各以文学见重于时，刘基长于诗，宋濂长于文，戴良则诗文兼擅。

一

刘基和宋濂是明初诗文的两大家，虽然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并未享有“李杜”、“韩柳”或“苏黄”这样的美誉，但是他们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并驾齐驱，交相辉映。他们年龄相仿，仅差一岁，在元明易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中，两人结下生死不渝的深厚友谊。把刘基与宋濂两人作比较是有意义的。他们在生活、思想、信仰及创作上，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具有比较的可行性。

刘基和宋濂一同在既是理学之邦又是佛道胜地的浙东地区长

大。他们思想的主要成分是由传统儒学发展而来的宋元理学，同时纳入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某些因子，呈现出儒、佛、道相兼并融的共同特色。他们思想上的差异表现在对不同的理学门派各有侧重，刘基的思想以程朱道学为主，又深受永康学说的影响，宋濂的思想以程朱道学为主，又深受陆学和金华学说的影响，也表现在对佛道二教各有所好，刘基恋道，宋濂迷佛。

刘基和宋濂在元明易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中忠实地实践了他们的思想信条。他们在元王朝生活的前半生，科举考试的成功或失败，使他们日后各自的人生轨道交错并存。刘基时官时隐，宋濂一直隐居，然而无论仕隐，他们都不得志，都在呼唤成就。至正二十年（1360）是刘基和宋濂人生道路上共同的一大转折点，自此他们的后半生，因为得到朱元璋的赏识和重用，较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抱负和才华，以刘基和宋濂为首的浙东文人对朱明王朝的创建功不可没。他们二人官至显位，名满天下。由于明初高压政治的影响，他们最后都没有获得善终。

刘基和宋濂的一生始终是以儒家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用世观念作为他们的理想追求，这不仅见之于他们的事功，也见之于他们的文章。明道致用是刘基和宋濂共同的文学主张，不过刘基强调文学“美刺风戒”的一面，宋濂强调文学“温柔敦厚”的另一面。他们的文学主张贯彻到不同样式的文学创作中表现不一。刘基和宋濂的寓言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末的各种社会问题，具有诙谐讽刺的艺术特色。刘基以诗见长，他的较有成就的诗歌主要体现了他对动乱现实的干预精神，“沉郁顿挫”是其艺术风格。宋濂以文见长，他的较有成就的散文主要体现了他对治平社会的辅化意识，“理明气畅”是其艺术风格。刘基和宋濂在诗文上各擅胜场，一起成为明代文学的开山祖。

二

戴良是一位著名的元遗民，关于他的生平行迹，现有文献著述中的记载存在诸多疑点，如戴良最早受聘于朱元璋，后来为何弃官逃遁？他远赴平江张士诚处，出任元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却在张士诚即将败亡之前，匆匆离去，原因何在？戴良由鄞渡海北上，此行有何目的？他中道寓居山东，何时而又南还？入明后，戴良被朱元璋征至京师，最终因何暴死？凡此种种，亟须求证或澄清。下编第一章在对戴良作品逐一进行阅读、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力图作出符合或接近于历史真貌的论断。

戴良生值元末，涉世颇深，交接甚广，下编第二章专门对其一生的主要交游情况进行考察，大致分为金华（今属浙江）、吴门（今江苏苏州）、四明（今浙江宁波）三个时期。所选交往对象大都正史有传，或《宋元学案》有录，一般有文集传世，或虽文集失传但时有文名者，即以文学或理学之士为主，侧重介绍他们各自的生平交谊与诗文往来，先后共录十九人，包括柳贯、黄潛、吴莱、余闕、宋濂、王祎、胡翰、朱震亨、陈基、谢肃、张宪、丁鹤年、汪汝懋、揭傒、滑寿、乌斯道、桂彦良、宋禧、苏伯衡。戴良别集《九灵山房集》或《九灵山房遗稿》，版本众多，《九灵山房集》今存单行本有明正统十年刻本、清乾隆三十七年重刻本、周心如跋清抄本等，丛刊本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九灵山房遗稿》单行本有清同治十二年重刻本，丛刊本有《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明正统十年本是否为《九灵山房集》的最早刻本？《九灵山房集》与《九灵山房遗稿》的关系如何？具体各

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为此，下编第三章进行了细致的辨析考订，得出的结论是：戴良别集《九灵山房集》或《九灵山房遗稿》，虽然存有诸多版本，但是祖本来源只有一个，即明正统十年原刻本，其余各本皆由此出。

下编第四章分别对戴良的理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文学思想进行阐发论证。戴良的理学思想渊源是多方面的，包括朱（熹）学、陆（九渊）学、吕（祖谦）学、陈（亮）叶（适）事功之学，但主要承传的还是由何基开创的金华朱学。受金华朱学学风的影响，戴良既博学多识，以践履实学为务，又究心经史，重视《春秋》。戴良一生主要生活的金华、四明地区，在当时不仅是理学名区，而且也是佛道胜地。作为朱学正宗传人，他思想中的佛道色彩也比较浓厚。戴良好道，主要乐在清静养生。戴良亦言佛，主要寻求精神的解脱。戴良既是一个学有师承的理学家，同时又是一个诗文名家，他的文学思想明显带有理学家文论观的色调。首先，戴良论文一以世运为本，认为文学与时代盛衰关系密切，强调诗文当鸣国家之盛，力倡复古雅正之文风。其次，戴良以世运论文必主于教化，从教化的目的出发，必然主张以文明道，文道合一，特别重视文辞、义理、政事三者的结合。然而，戴良晚年论文开始强调作者独立人格精神的表现，这是时代政治和个人境遇发生变化之必然结果。

戴良诗歌创作中最具价值的部分是五言古和五、七言律，下编第五章选取其中两种独具形式的和陶诗和纪行诗进行分析论述，以此窥知其诗成就。戴良的和陶诗虽然完全依照陶诗原韵原字，进行追和，但在内容上大致存在三种情形：有的刻意效仿，与陶诗原意相合；有的与陶诗原意相似又非似；有的仅步原韵，而与陶诗原意并不相关，只是任意抒写一己之感受。

戴良和陶诗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羁旅思归、固穷安贫与忧时伤生。戴良的和陶诗于平淡自然中更见悲凉慷慨之气。戴良的纪行诗包括“发吴门”五言古十一首，“泛海”五言古八首，五、七言律各八首。其中五古纪行组诗并不着力于山水景物的描写，而以叙事为主，兼及议论抒情。五、七言律纪行组诗则强化了写景抒情的成分。

戴良散文体裁多样，内容丰富。序、记、题跋、碑志、论说、哀祭、传、书在记人叙事或言志抒情或说理理论上，大都表现出较强的艺术性。下编第六章对此八类文体在思想艺术上的主要成就进行逐一阐述。序文是戴良散文创作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主要包括诗文集序、书籍著作序、赠序、宴集序、唱和诗序等。其中戴良的赠序文皆为送别朋辈而作，往往能够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针对性强，写法灵活多变。或先是在开头进行议论，然后引出送别对象加以观照，对被送者寄予慰勉之意。或先对赠别对象其人其事进行叙写，同时交待一下送别缘由，接下来是议论、抒情。戴良的记体文主要是斋、堂、楼、院记，另外还有图画记、人事杂记等。其中斋堂楼记往往围绕其命名大做文章，发表见解，阐明道理。有的议论以文思翻转、跌宕起伏见长。有的议论还不时运用史实和比喻，使说理与形象结合起来，深入浅出，生动有致。有的议论笔带感情，既是说理，又是抒情，情理兼胜，富有气韵。戴良的文学类题跋，或睹物怀人，或言事说理，或评文论艺，或怡情遣兴，不仅题材广泛，而且表现手法丰富，体式灵活。戴良的碑志文善于运用概括凝练的笔法，通过语言、行动的描写，展示人物主要的性格特征，虽以叙事为主，但也兼及议论与抒情。戴良的传记文有的总括人物生平功德以述之，用笔凝练传神，形象塑造鲜明、生动。有的紧紧围绕传主一件典型事件而展开，叙议相兼，平分秋色。戴良的哀祭文包括哀辞和祭

文。哀辞以抒情为主，或为骚体，或四、七言句相兼，或四言句与骚体相兼等。祭文或纯为四言韵语，或为散体，或为骈体。戴良的论说文多以“论”、“说”或“解”等为题，善于运用譬喻，论述事理，形象生动，极具艺术感染力。戴良的书简以情真意切见长。

下编第七章戴良年谱，是在《四库全书》本《九灵山房集》卷首《戴九灵年谱》的基础上增补考订完成的。本年谱编年以戴良的主要生平事迹和各时期先后创作的重要作品为主，所征文献力求做到准确、翔实。对于谱主事迹或创作中存在的疑点，力求做到辨论释惑，尽可能给予客观合理的解释。